

走进中国书房，感悟文明的力量

本报记者刘小草

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”一篇人人耳熟能详的《陋室铭》，将对书房的想象刻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。

从刘禹锡的“陋室”到蒲松龄的“聊斋”，从杜甫的“草堂”到陆游的“老学庵”，从梁启超的“饮冰室”到鲁迅的“老虎尾巴”……读书人的书斋从来都不仅是存放书籍、查阅资料、方便书写的场所，而是著书立说、寄托情感、赓续文脉的精神空间。

随着网络、电子阅读的普及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拥有一间实体的书房已非必需。但在读书人的精神角落，总有一片天地，是属于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的。

回顾今年的故宫博物院午门大展“照见天地心——中国书房的意与象”，让人们有机会从午门出发，在书画、器物、家具等展品中，回望、想象、走进中国书房，体会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书房的意与象

书房，古称书斋。书籍与房舍，构成了书房的实体存在。从仅可容膝的陋室草堂，到四库充栋的皇家庭院，书斋可藏于市井，可隐于郊野，并无一定之规。但书斋作为集读书学习、著书立说、明心见性于一体的文化空间，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张小李认为：中国传统书房萌芽于先秦私塾，其范式在唐朝确立，并延续至后世。

清官书房众多，是古代书斋文化的集大成。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，便是“搬”来的两间乾隆书房——“五经萃室”和“香雪”的意象原状。

“五经萃室”占地不足6平方米，是乾隆在昭仁殿后专门隔出的一间小书房，保存着他认为是岳飞之孙岳珂校刻的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五经。书房格局紧凑，上方悬挂着乾隆楷书的“五经萃室”匾，下方是一扇紫檀木嵌楠木髹漆的炕屏，刻有《五经萃室记》。炕屏前的楠木十六屉炕桌，为存放“五经”之处。可以想象乾隆当年盘腿坐于炕上，随手从炕桌上取书翻阅的场景。

而步入东雁翅楼的“香雪”，则会沉浸在巨大的视觉震撼中——身边是叠叠宣石，片片飞雪；虚拟的轩窗外，松竹梅凌霜傲雪。借助裸眼3D等现代科技手段，展览中虚拟的实景还原了乾隆“香雪”书房独特的审美趣味，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香雪海幻境。

“香雪”与一般意义上的书房大异其趣。书房内大量白色宣石堆叠成山，宣石山背后是通体青蓝色背景的松竹梅花鸟贴落画，窗外翠竹千竿。“香雪”室内，“梅花”元素反复出现：乾隆皇帝一生酷爱梅花，他曾多次到苏州邓尉山香雪海赏梅，也喜欢画梅，热衷于收集鉴赏著名的梅画。他不仅常用梅花装饰建筑、用品，而且喜用梅花作喻。这间书房建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，位于养性殿西耳房，是乾隆皇帝计划归政后颐养天年的一处私人空间。虽是书房，“香雪”却并无藏书，在宣石、梅花的环绕中，可以自省内观，任思绪放逐天地间。

乾隆皇帝于宫内外建有众多的书房，有名的书房就有三希堂、长春书屋、抑斋等处。为何展览偏偏选择这两间书房？

回答这一问题，这就要回到展览的题目“照见天地心——中国书房的意与象”，书房既是有形的，又是无形的，既是入世的，又是出世的，既是游方之内的，又是游方之外的。”策展人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说，“三个展厅以三座书房为主线，串起整个书房的意与象。西雁翅楼即西展厅‘委怀琴书’，以‘五经萃室’书房来展示书房的根即文脉在于儒家五经。正殿‘正谊明道’单元，是以乾隆漱芳斋书房正谊明道来展示书房的价值在于‘得志，泽加于民，不得志修身见于世’的修身养性与家国情怀。不过，正谊明道‘书房，大家不易看出来，因为我们只用了‘正谊明道’这块匾来表示，并没有展示书房结构。东雁翅楼即东展厅‘结契霜雪’，以‘香雪’书房来展示书房的雅集，霜雪指梅花。梅花代表诚实，即孔子说的‘友谅’，古代文人常常把梅花比作朋友，‘结契霜雪’即与志同道合者为友，彼此相约，相聚于花园、山林，畅叙幽情，俯仰天地，孔子说‘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’，这正是雅集的目的。”

书房既是有形的，有藏书，有陈设；也是无形的，安住着读书人丰富的精神世界。读书人在书房中读书、写书、藏书，思考自我、社会和自然的关系。他们既可以“入世”，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天下联系在一起；也可以“出世”，走向审美的、广阔的精神世界，与人、与天地相交流，与万物化为一气。

讲书房，其实是为了讲人。书房是如何被塑造的？王子林认为：“书房应当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的体现。孟子说过‘人知之亦嚣嚣，人不知亦嚣嚣’，如果读书人有了这种豁达的胸襟，就可以实现‘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’的理想。”

《大学》讲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孟子说，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，所以古代读书人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，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天下联系在一起。

展览的三个部分，分别对应着理解书房的不同角度。“委怀琴书”出自陶渊明诗句“弱龄寄世外，委怀在琴书”，陶渊明自认为十几岁时就不再考虑世俗之事，将情怀寄托在琴与书上。这是书房之于文人最纯粹的意义。第二部分“正谊



▲南宋 何筌 草堂客话图册页(局部)



▲鲁迅的书房兼卧室“老虎尾巴”。新华社资料片

明道”展示了书房“入世”的一面，展品如文天祥《行书上宏斋帖卷》、徐渭《行书昼锦堂》记轴、陈淳《行书岳阳楼记卷》等书画作品，借名臣欧阳修、范仲淹、文天祥等人的作品，抒发读书人的家国情怀。第三部分“结契霜雪”，则走出书房的实体空间，关注人间的交往聚会，再进一步走向广阔的自然山川，与天地宇宙相交流。

展览中有一张尺幅不大的小画，颇具代表性——宋代何筌的《草堂客话图册页》。画中垂柳掩映，茅庐亭台俨然。草庐中二人对坐攀谈，右侧庭中一人高卧。远处一小童正放牧归家，一派田园耕读风光。王子林介绍，在策展阶段，自己第一次看到这幅画，就“马上兴奋起来”，“画中草庐和亭子组合在一起，不就是‘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’吗？这不就是入世与出世的关系吗？”“诸葛庐”即刘备三顾诸葛亮的“茅庐”，“子云亭”说的是文豪扬雄的读书亭。二人曾曾身居一隅而胸怀天下，也都经历过“出世”和“入世”的变化，诠释了“仕”与“隐”两种理想境界。

寻找“书房的根”

灯光点亮了北方七宿中的两颗星。展厅的第一个空间，属于一张古老的星象图。

“东壁二星，主文章，天下图书之秘府也。”《晋书·天文志》记载，在古代的星象图中，东壁是藏书的地方，是天上的图书府。

找到“书房的根”即书房的文脉，是书房展览中最大的难点。除了故宫藏品特色，还要结合当代艺术作品，策展一年多，展览大纲改稿20余次。

王子林说：“历史上第一间书房、第一个图书馆，已难觅踪迹，但我们的祖先充满了智慧，他们把传承文明的图书馆投射到了天上，使保存经典文献的事业变成永恒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抬头望天，壁星永远都在。壁星的光辉将照耀我们的古人建造更多的图书馆，只要天上的壁星在，我们的文明就在。这是星空给我们古人的启示。”

所以天上有壁星，地上就有鲁壁。“鲁壁出书”的故事，见于《尚书序》的记载。西汉景帝三年（前154年），鲁恭王刘餘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，发现墙壁中藏有《尚书》《礼》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，传为孔子第九代孙孔鲋为避秦焚书所藏，宋代陆游《晴窗读书自勉》诗有“天全鲁壁藏，不堕秦火虐”之句。如果说壁星是天上永恒的图书馆，鲁壁就是文脉在人间绵延不绝的象征。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

“五经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，也是古代文化的根，由壁星、鲁壁，我们联想到了紫禁城里的‘五经萃室’，于是产生了将壁星、鲁壁与‘五经萃室’连为一线的展示设计灵感，即由壁星发出的光，照亮了紫禁城里的‘五经萃室’。”王子林指出：“从壁星到鲁壁，说明书房的根在五经，五经是示天理正人心的经典。这条文脉，从天上一直延续到了紫禁城里，千年不断，文脉得以永续。”

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也是极爱书之人，在青州时曾有藏书楼“归来堂”。二人爱书成痴，宁可“饭蔬衣缕”也要购书，以至家中“几案罗列，枕席枕籍”到处是书。靖康之难后，夫妻二人千挑万选，带着“书十五车”南奔逃难，没能带走的书籍尽遭劫掠。没过几年赵明诚去世，李清照又只身带着大批书籍南下，一路走、一路丢，不是被掠走，就是被小偷凿壁偷去，只留下丈夫所著的《金石录》。她在《金石录后序》里感叹：“何得之艰失之易也。”人的命运与书之聚散，令人无限唏嘘。

书房中也有不少趣闻。东汉时期的文学家王粲，博闻强识，却有一个怪癖，喜欢听驴叫。他去世时，曹丕参加葬礼，还令前往吊唁之人集体学驴叫。传说他在家中专门建了一个“吟驴亭”，一边读书一边听驴叫。诗人陆游

“史”或“府”。传说中老子曾任的“柱下史”一职，也是掌管皇家图书馆的官职。汉朝时，长安未央宫旁盖有石渠阁、天禄阁、麒麟阁三座皇室藏书阁。为了方便贮存，防火防潮，藏书室用石块砌成，书籍用铜皮包裹，即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提到的“石室金匮”。

东汉文学家蔡邕藏书近万卷，《后汉书》中记载，蔡文姬归汉后，向曹操提及家中藏书，“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，流离涂炭，罔有存者。今所诵忆，裁四百余篇耳”。可见父女皆是爱书之人。

隋唐时期，纸张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，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的广泛流通成为可能。而随着科举取仕的出现，文人阶层迅速崛起，开始著书立说，书房藏书的需求增加。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《陆文通先生墓表》中形容著作等身，称“其为书，处则充栋宇，出则汗牛马”。

唐代许多文献中，都出现了文人在书斋中读书、作画、筹谋、著述的记载。有刘禹锡在陋室“调素琴，阅金经”；有白居易在庐山草堂“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、道、佛书各两三卷”；也有悲惨如杜甫者，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”……有研究统计，《全唐诗》中收录反映书斋理趣的诗共计两百余首，作者近百人，以书斋为中心的绘画更是延续到后世。种种迹象证明，在唐代时，就已经在文人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，成为文学、绘画作品中重要的题材或意象。

书房：一种生活方式

“至哉天下乐，终日在几案。”

大文豪欧阳修曾在《读书》诗中直率地感叹。

在书房内饱读诗书，逐渐成为一种刻入读书人骨髓的生活方式。

作为读书人精神空间存在的书房，承载着主人的心性与志趣，故而文人墨客在为书房取名时，往往选用寓意深刻的词句，并辅以表示空间的斋、堂、屋、居、室、庵、馆、庐、轩、园、亭、洞等字眼。文人也多将文集以书房命名，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、赵孟頫《松雪斋集》等。

图书的丰富催生了藏书业的兴盛，收藏书籍尤其是珍本书，成为文人一大雅好。宋元明清几代，私家藏书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，乡绅、商贾乃至一般的读书人都开始出现藏书的习惯，藏书家人数剧增。如福建莆田藏书家方峻，其“白杜万卷楼”藏书约在五万卷以上，是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。到了清代，有明确史实记载、藏书达5000卷以上的藏书家已超过3000人，并涌现出“清代四大藏书家”。

南宋词人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中说，“世间万物，未有聚而不散者，而书为甚”，并专列《书籍之厄》一节，担心书籍遭受“书厄”荼毒，可见藏书家对书的珍视。周密出身藏书世家，祖孙三世积累，靠着“具搜极讨，不惮劳费”，“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，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”。

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也是极爱书之人，在青州时曾有藏书楼“归来堂”。二人爱书成痴，宁可“饭蔬衣缕”也要购书，以至家中“几案罗列，枕席枕籍”到处是书。靖康之难后，夫妻二人千挑万选，带着“书十五车”南奔逃难，没能带走的书籍尽遭劫掠。没过几年赵明诚去世，李清照又只身带着大批书籍南下，一路走、一路丢，不是被掠走，就是被小偷凿壁偷去，只留下丈夫所著的《金石录》。她在《金石录后序》里感叹：“何得之艰失之易也。”人的命运与书之聚散，令人无限唏嘘。

书房中也有不少趣闻。东汉时期的文学家王粲，博闻强识，却有一个怪癖，喜欢听驴叫。他去世时，曹丕参加葬礼，还令前往吊唁之人集体学驴叫。传说他在家中专门建了一个“吟驴亭”，一边读书一边听驴叫。诗人陆游

也曾调侃自己的书房，作《筑书巢》一文，称书房“乱书围之”，仿佛一团鸟窝，甚至有客人来访时，想进进不来，进来了又出不去，左右为难，引为笑谈。北宋名臣韩琦的书斋“昼锦堂”建成时，差人请好友欧阳修题写。欧阳修闭门拟稿，一挥而就，当即送与韩琦。可到了晚上反复琢磨，又觉得起句“仕宦至将相，锦衣归故乡”太平，马上差人快马追赶，一定要把那不甚满意的初稿追回，补上两个“而”字。

可见，文人的书房生活并非只有埋首书海，而是相当富有情趣的。欧阳修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他在解释其缘由时说：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；以吾一翁，老子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把诗书、金石鉴藏与下棋喝酒等日常娱乐并列。周密的父亲周晋在《清平乐》中记录过自己的书斋生活：“图书一室，香暖垂帘密。花满翠室熏研席。睡觉满晴日。手寒不了残棋。篆香细勘唐碑。无酒无诗情绪，欲梅欲雪天时。”在满室图书中考据金石、品香插花，又可饮酒作诗、观梅赏雪，自成一方天地，何乐而不为？类似的还有清代学者钱谦益，《藏书纪事诗》中记录他在书斋“怀古堂”中过得丰富多彩：“明窗染几，丹黄校勘，似陆龟蒙；蒲团若碗，栖心释梵，似白乐天；归池泼墨，淋漓绢素，似米元章；钟鼎彝器，金石翰墨，辨别款式，似赵明诚；而忍辱不较，阖户自守，又似管幼安。”

明清时期是书斋史上的鼎盛期，文人学士建造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书斋。简朴如归有光的“项脊轩”，年久失修，空间狭小，却有“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”的景致；雅致如张岱的“梅花书屋”“不二斋”，种花垒石，景色宜人，主人终日坐卧其间，“非高流佳客，不得辄入”。

明代文人关注日常生活，热衷于将对美的要求诉诸文字，特别关注“雅俗”之辨。相应的，明代中晚期出现了一批专门探讨书房陈设、审美的文章。明代戏曲家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书房“宜简不宜繁”，要有“高雅绝俗之趣”。明代文人高濂的养生杂谈《遵生八笺》中，专列《高子书斋说》一则，认为“书斋宜明清，不可太敞”，并一一罗列盆景、家具、文具、架上图书该如何摆放，甚至列出70多种书房必备藏书。文征明曾孙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一书，可谓晚明生活美学的集大成之作，沈津为《长物志》写序说：“几榻有变，器具有式，位置有定，贵其精而便，简而裁，巧而自然也。”书中对书房的选址、环境、内外陈设，甚至笔筒、砚山等器物都有细致入微的要求。“长物”即身外之物，饥不可食、寒不可衣，书房并非生活必需品，却具备丰富的审美价值、精神意涵。

1920年夏，27岁的毛泽东来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。多年后，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：“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，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，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1920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李达、王会悟夫妇也是在这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在老渔阳里2号二楼小小的亭子间，夫妻二人通宵达旦，撰写稿件、校对刊印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——《共产党》月刊，第一次在中国树起“共产党”的大旗，阐明共产党的基本主张。

这位中年人就是陈独秀，随他一同迁入的

还有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这里是他的住所、书房，也是工作地。同年6月，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成立。

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20年代，这里曾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：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陈望道、翻译《马克思<资本论>入门》的李汉俊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俞秀松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，以及年轻的毛泽东……

一楼客堂间里，摆着一把皮面靠背摇椅，陈独秀是就坐在此处，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的，以至于不得不在小黑板上写下“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”的句子。

1920年夏，27岁的毛泽东来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。多年后，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：“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，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，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1920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李达、王会悟夫妇也是在这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在老渔阳里2号二楼小小的亭子间，夫妻二人通宵达旦，撰写稿件、校对刊印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——《共产党》月刊，第一次在中国树起“共产党”的大旗，阐明共产党的基本主张。

这一间间书房，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。它们承载着新青年们的朝气与梦想，见证着觉醒年代的先行者们如何披荆斩棘，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。

百年风云际会。随着科技发展、纸质出版物日渐式微，阅读、写作、传播的形式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书房甚至“白纸黑字”都不再是必需品，我们的精神生活又将安放于何处？

在一篇题为《移动的书房》的文章中，作家冯骥才迎来了又一次书房“革命”：这一次，iPad是他“流动的书桌”，汽车和飞机是他“移动的书房”。

他扪心自问：“我的书房书桌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书房书桌了吧？”

“不，应该说，它们仅仅是我的书房和书桌的一种延伸，也是一种开创。我的‘心居’，仍是我心之所居。一切往日情景，今日依然都在。或曰：今日之枝，乃出于往日之木也。”他自答道。

参考文献：朱亚夫、王明洪《书斋文化》
张小李《书房简史》
王明洪《明清时期的书斋文化》
刘超《北宋文人士大夫日常书斋生活与尚意书风——以欧阳修为研究中心展开考察》等

书房的革命

作家冯骥才在